



水族学者

潘一志文集

贵州民族学院 · 贵州水书文化研究院 编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水族学者

潘一志文集

贵州民族学院 · 贵州水书文化研究院 编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族学者潘一志文集 / 贵州民族学院, 贵州水书文化
研究院编. —成都: 巴蜀书社, 2009. 11
ISBN 978-7-80752-52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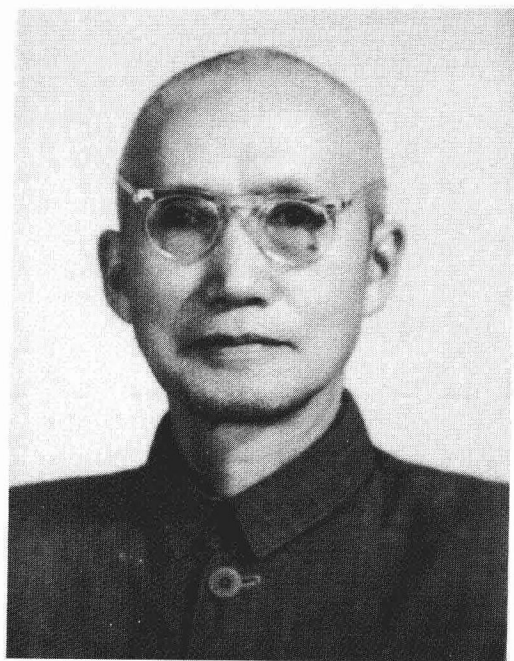
I. 水… II. ①贵…②贵… III. ①水族—民族历史
—文集②诗词—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K286.9-53
I 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5358 号

水族学者潘一志文集 贵州民族学院·贵州水书文化研究院 编

责任编辑	张玉亮 周文炯
封面设计	潘淘洁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 (028) 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 (028) 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翔川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10mm×148mm
印 张	20.625
字 数	500 千
书 号	ISBN 978-7-80752-520-2
定 价	3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潘一志先生 (1899—1977)

【序一】潘一志的作品与人格力量

唐建荣

《潘一志文集》由《水族社会历史资料稿》、《潘一志诗词》汇集而成。这是潘一志先生为社会、为水族人民留下的宝贵丰厚而永恒的精神财富。中国 55 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悠久而可圈可点的历史，而且不乏学富五车的贤达。但是，当我们环顾四周，能像潘一志先生那样数十年孜孜不倦耗尽心力为本民族撰写出一部三十余万字历史资料稿者，却是凤毛麟角。尤其对没有通行文字记载自己的历史，而只有语焉不详或观点偏颇的汉文献史料之水族，更彰显《水族社会历史资料稿》的分量与作者的人格魅力。

潘一志先生 1949 年以前主要是搜集文献、汇总资料，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不断接受新科学理论，认真研读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斯大林民族问题言论摘编》等著作，把水族历史发展放在中华民族大家庭发展中来研究，他站在历史唯物论立场上，摆正了为自己民族立传的心态，对资料进行科学缜密的认真梳理，客观地论述了水族历史发展的脉络和精

神风貌。

《水族社会历史资料稿》脱稿于1960年，正值国家处于三年困难时期，潘一志克服了来自各方面难以想象的困难，利用业余时间，复写了6份书稿送自治州内有关领导和部门，后因不能满足需求，又自费购买钢板、油印机、纸张，抽业余时间刻写油印21份，分送省内外有关部门和专家，该书得到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研究专家的高度评价。以后，潘一志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一年，又吸取北京许多专家学者意见，对书稿进行修改，拟用打字纸再次油印60份。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修订本连同油印机、钢板、铁笔一起被“造反”的红卫兵抄走而灰飞烟灭。“文革”刚结束，潘一志大病未愈，念念不忘的仍是要对书稿进行修订。他两次向有关部门报告，要求退回被抄走的书稿，未能如愿。1977年12月4日，潘一志抱憾病逝于贵阳。

潘一志为水族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为水族地区社会经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水族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水族人民无限怀念水家的这位文化名儒。1995年12月19日，潘一志逝世18年后魂归故里（三洞乡梅山村）安葬，受到了家乡人民隆重而盛大的欢迎。三都、荔波、独山、都匀、凯里、榕江、广西南丹等地水家人自发地派代表去梅山迎灵。当潘一志的骨灰灵轿到达时，成千上万在山路上夹道迎候的人们双手伏地，长跪路边，迎候潘一志魂兮归来。水族人民以自己最高礼遇回敬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民族文化豪杰之场面，正是潘一志的作品与人格力量在水族山乡折射的镜头。

潘一志诞生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原名益智，字若愚，乳名志，水族，贵州省荔波县三洞里（今三都水族自治县三洞乡）人。祖父、父亲系水族著名的儒生，两代开办家庭私塾。祖父潘文秀是晚清秀才，别号月中居士，拒入仕途，自开家族学馆教授学生。父亲潘树勋从小受潘文秀严格教育，学习勤奋。20岁时又到县城拜黔中名士李肇同为师。学成归乡后将家族学馆扩大成招四乡青年的“梅山学馆”。梅山学馆为水族地区的文化传播、人才培养起到了积极作用，每年住读该学馆的学生达30余人。

潘一志出生取名就反映了长辈对儒家文人的崇敬。“若愚”源于宋代著名儒家文人苏东坡《贺欧阳修致仕启》：“大勇若怯，大智若愚”；“益智”取至宋代叶适《送赵几道邵武司户》诗：“书多前益智，文古后垂名”。“益智”、“若愚”两者构成一种对立的和谐，其中寓含着辩证的哲理。

潘一志三岁发蒙，祖父潘文秀亲自教授汉语、汉字。祖父逝后，他又继续随父亲在学馆学习。经过十多年苦读，通晓经、史、诗、文。1918年，又赴都匀十县合立中学（四年制）改读新学。都匀十县合立中学是当时贵州仅有的几所传播新文化、重视新学的突出学校，老师中既有受儒家浸染至深的秀才、硕儒，也有留学日本归来，受新文化影响的新派教师。潘一志就是在水族文化、儒家文化、海外文化和新文化碰撞交融中，完成了知识分子的“文化的自觉”。

入学时，潘一志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立志强健体魄，珍惜光

阴，学好强国技能，之后他效先祖忠烈，精忠报国的思想伴随其终生。潘一志产生这样的思想，与家庭和梅山学馆积极入世的儒学教育、与合立中学关注国家、民族安危的优良校风是分不开的。这一切，奠定了潘一志一生爱国救国报国的思想基础，酿就他“穷，则注重修身治学养性；达，则力图济世为民效国”的情怀。1947年初，潘一志弃官隐居深山，开办农林场进行农村社会改革试验，这既是他对新制度新生活的顽强追求，也是他“矜念民生”思想的具体体现。总之，潘一志无论读书、从军、从教还是从政、隐居，对社会始终采取了积极入世的有为态度。天下为公、重民、惜民、爱民、重道德价值、主仁政、反侵略、反暴政、反贪官污吏，同情民生、洁身自好，公而忘私、渴望大同等思想在他身上处处闪光。

二

潘一志 78 岁的人生年华经历了急剧变化而截然不同三个社会制度，他在腐败的晚清时期度过 12 年，在军阀混战的民国时期煎熬 38 年，在新中国的环境中生活 28 年。新中国建立之后，潘一志亲历了土地改革，亲历了“三反”、“五反”及反右斗争运动，亲历了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运动，亲历了是非颠倒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不管世事风云变化，潘一志一生勤于思考，勤于写作，撰写了《水族源流考》、《水族潘姓源流考》、《荔波县志资料》、《荔波县志稿》、《潘新简反清斗争史略》、《水族社会历史资料稿》等重要历史著作。人生感悟、历史事件，都融入到他创作的诗词之中，他精选 300 余首汇编成集，名为

《新旧人生观诗稿》。他还深入民族地区调研，写下了数万字的调研学习笔记，研究思考水族地区财政问题、民族干部（尤其是妇女干部）培养问题、民族关系问题，并上书中央呼吁重视民族问题。“文革”中，他受到不公正批判，但他坚持真理，保持独立人格，最后受尽凌辱，积怨成疾。“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百废待兴。“关怀国是心如结，轸念民生志未酬”的潘一志先生尚未盼到被抄没之书稿的整理出版，尚未看到改革开放曙光渐显的黎明，就抱憾长逝了。

“一个少数民族知识分子荣辱不移的报国情结，一个多次逃离官场而以垦殖明志的山林隐士，一个由文化催生而又被‘文化’摧残的不死魂灵。”——冯举高先生在《弯路直走·潘一志传奇人生实录》一书封面，用这三句话很精确地概括了潘一志半世坎坷、经历传奇，而又充满矛盾的一生。

三

《水族社会历史资料稿》是水族人民珍贵的精神财富，1980年，三都水族自治县的八位水族同志关于《请求落实民族政策解决水族文史资料抢救等有关问题的情况报告》的万言书得到党委和政府的重视，成立了三都水族自治县民族文史研究组，该书就被列为整理出版的首选项目。当时努力搜寻所得的油印文本由于纸质很差，油印本字迹模糊，鼠啃虫蛀，句断篇残，给整理工作带来极大困难。王品魁先生历尽艰辛抄录全书，进行补字接句工作。1981年，王品魁、石国义带书稿到广西河池付印，并写了出版序言《潘一志先生和他的〈水族社会历史资料稿〉》。此后，《潘一志诗词》由王品魁先

生整理，先后由三都县文史研究组、三都县政协付印内部出版。

近年出版的 85 万字的《中国水族文化研究》，在第一卷以万余言评述《水族史学奠基人——潘一志》；冯举高同志倾注数年心血写成 33 万字的《弯路直走·潘一志的传奇人生实录》。这些，足以表明水族家乡人民对潘一志先生的崇敬与爱戴，足以慰藉潘一志先生在天之灵。

《潘一志文集》正式出版，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与条件。

正式出版的主要原因：

一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内部印刷的《水族社会历史资料稿》、《潘一志诗词稿》，已不能适应水族文化研究和对外交流的需要。

二是为了科学准确反映《潘一志文集》的历史风貌。因为《水族社会历史资料稿》、《潘一志诗词》有复写版、油印版本多种，而新版本抄录时作者又作了一些补充与调整。当时三都县文史研究组付印的书稿仅依据所掌握残缺而较为模糊的油印本为蓝本整理，参照版本显然不足。

三是内部出版的《水族社会历史资料稿》、《潘一志诗词稿》，由于油印本字迹模糊，鼠啃虫蛀，断句残篇，除了给整理工作带来极大困难之外，印刷厂在校对改正方面存在着较大的补救空间。

正式出版的主要基础：

一是潘一志先生的各种手稿相继发现，尤其是先生之子潘茂金搜集到的抄本最多，为接字补句、匡正讹误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二是贵州民族学院建立贵州水书文化研究院之后，把正式出版《潘一志文集》列为首选的课题。

三是潘茂金先生卸任黔南州文联主席之后，摒弃其他工作，数年如一日，全身心投入到对其先父遗稿整理的工作中，主要完成的工作是：对照数种版本手稿，校正内部铅印本的若干错误；用电脑逐字逐句录入全书；重新绘制书中各种插图；搜集珍贵的历史照片；纠正因历史原因，作者违心的一些论述或提法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潘茂金先生没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倾力奉献精神，如果潘茂金先生缺乏家学渊源与学术功底，社会也难看到全新的《潘一志文集》。这是梅山学馆的遗韵，这是潘一志先生精神的延续，这是水族的幸运，这是水家学研究的幸运！同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重视历史传统在水族知识分子身上的闪光。

我和我校潘朝霖研究员怀着对潘一志先生无限崇敬的心情，在参加国家课题子课题《水族哲学思想史》一书两次出版撰稿中，都列出专节对其进行评述。另外本人还发表《孔子儒家思想对水族文人潘一志的影响》等论文。可喜的是，该论文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孔子基金会纪念孔子诞辰 2540 周年学术讨论会文集（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潘一志文集》的正式出版，是历史给我们提供了机遇，为此写下心中对潘一志先生的崇敬之情，怀念之情，以及对潘茂金先生付出艰辛工作的感激之情。

2008 年 6 月于贵州民族学院

【序二】一部珍贵的水族社会历史史稿

冯举高

贵州民族学院贵州水书文化研究院编辑的《潘一志文集》即将出版，闻此消息，我十分兴奋。其实，我在十多年前就开始接触潘一志先生的著作了。1993年，我在图书馆进行文献分编时首次读到《潘一志诗词稿》，当时就被潘一志坎坷的人生经历、特立独行的仁者风范和突出的文化贡献所感动。为了窥探这位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我很认真地阅读了他的《个人简历》和《水族社会历史资料稿》等遗稿和著作，初步了解了潘先生的理想追求和治史思想，于是，我开始系统地搜集相关文献，并到水族地区进行调查采访，准备写作潘一志传。经十年艰辛，数易其稿，长篇纪实传记《弯路直走：潘一志传奇人生实录》终于由贵州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如果说，潘一志先生軫念民生、矢志报国的人格魅力是我创作《弯路直走》的动力，那么，潘先生的《水族社会历史资料稿》就是我了解水族社会历史的文献依据，《潘一志诗词》则是我描绘20世纪贵州历史风貌的色彩来源。因为长期从事地方文献的整理与研

究，我对《潘一志文集》有着许多的阅读体会。

著名的水族文史专家潘一志，出身于一个水族文教世家，他自幼受水族文化滋养，后又接受了系统的汉文化教育，因而集水、汉文化于一身，著有《荔波县志稿》（主纂）、《荔波县志资料》、《水族简史简志》（合编）和《水族社会历史资料稿》等方志和史论多部。在任民国荔波县县志整理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由县长挂名）之前，潘一志已与著名的社会学、民族学学者岑家梧、李方桂、张为纲等人建立了学术交流关系，从中学习了许多社会学和民族学知识，因此，他1944年主纂完成的《荔波县志稿》中的“氏族志”，不论在纲目设立或田野调查资料的运用方面，都显得十分科学。“氏族志”的成功，使潘一志萌生了编著一部民族志的念头，因为社会、政治等原因，他的计划被搁置了很久。1959年，时任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政协副主席的潘一志，参加中央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赴三都调查水族社会历史，之后又参与了《水族简史简志》的编写工作。手中握有丰富的水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又具备了编写专志的经验，潘一志坚定了编著水族史的信心，仅一年的时间，他就完成了《水族社会历史资料稿》的初稿，全稿30余万字。遗憾的是，经广泛征求意见和反复修改，第二次刻写、油印出来的《水族社会历史资料稿》还未装订成册，就被造反派当作封资修黑材料抄走了。“文化大革命”不仅深重地摧残了潘一志的身心，还对他用十数年心血凝结成的学术成果进行了无情的屠戮。潘一志辞世三年之后的1980年，三都水族自治县民族文史研究组的专家学者，历经艰难，整理编印了险些散失的《水族社会历史资料稿》。由于受经济条件限制，当时只能内部印刷，加上印数有限，因此，除一些地方文教部门和少数

文史机关外,《水族社会历史资料稿》还不为更多的读者所知道。28年之后的今天,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学术方面,民族学、民族史的研究成果数不胜数,在这种思想活跃、信息海量且流通速度快得惊人的当下,不论从历史的角度或者理论的角度来看《水族社会历史资料稿》,它都具有极高的理论研究价值和文献参考价值,就文本而言,它还是一部独具特色的历史文献索引。

1. 作为第一部水族史稿,《水族社会历史资料稿》为水族的民族史和社会发展史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建国之初,人民政府聘请在少数民族社会中享有很高威望的潘一志为国家干部并委以重任,在参政过程中,潘一志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世界观和治学思想的根本改变,使他学会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来观照一个民族的发展。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提高和学术视野的拓展,《水族社会历史资料稿》的论述就有了思考的深度,他大胆摒弃个人的民族情感,坚持唯物史观,将水族社会的发展始终置于整个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长河之中。与此同时,作者又以厚重的历史文献为支撑,再参考大量的民间歌谣及民间传说,对水族的族源、族称及迁徙等进行了科学的梳理,他不偏信古代文献的史官之言,也不偏听各种民间传说,包括祖父潘文秀所撰的家谱也不盲目采信,尊重历史的治史思想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使得他的民族发展史观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这些理论至今仍然为许多学者所采用。

2. 《水族社会历史资料稿》中丰富的文献征引和鲜活的社会调查材料,为此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便捷的文献检索路径和可信的实证资料。关于水族的族源族称,民间传说很多,这些以故事、歌谣

为载体的口头资料，很难构成一部完整、可信的民族史，潘一志广览正史、野史、方志，以大量的历史文献来支持自己的理论观点，确保了立论的坚实基础。在《水族社会历史资料稿》中，潘一志引用了《史记》、《汉书》、《明史》等二十四史及《（乾隆）贵州通志》、《黔史》、《遵义府志》、《麻哈州志》、《都匀县志稿》等历史文献40余种，还有大量经他本人考证过的谱牒及碑刻。这些相关文献的引征，不仅证实了水族社会发展的艰难历程，同时还构成了这部史著用文献说话的独特叙事方法，这些文献的罗列，有如一部明析的文献索引，成了我们研究水族历史时查阅相关文献的一条路径。在《水族社会历史资料稿》中，有关水族地区的地理、山脉、河流、交通情况和社会经济情况，尤其是民国时期水族地区的农业生产、税捐、文化教育等统计数据，大多是作者亲自调查所获，这些地情、族情资料，成了我们研究水族社会发展史的珍贵文献。

3. 忠实地概括水族的人文精神特点，为民族英烈树碑立传，理直气壮地纠正或驳斥历代文人、史家歪曲水族历史、歧视水族文化习俗的言论，使《水族社会历史资料稿》成了民族史志编修的范本。历代封建统治者都视少数民族的抗暴斗争如洪水猛兽，偏居于西南一隅、人口不是很多的水族人民，历次抗暴斗争的结局尤其不幸。还在民国末期，在编纂《荔波县志稿》时，潘一志就试图为清末水族农民起义领袖即正史所谓之“反贼”潘新简正名，虽然努力未果，但毕竟在叙述那段历史时，将“反贼”等侮辱性用语去掉了，这在当时，已是难能可贵。建国后，潘一志多次为潘新简的历史功绩奔走呼吁，在《水族社会历史资料稿》成书前，他就在《贵州文史资料》上发表了《潘新简反清斗争事略》。在《水族社会历史资料稿》

中，他理直气壮地批判历代文献对水族革命斗争史的歪曲，勇敢地将史上的水族农民抗暴斗争写入中国农民起义斗争史。潘新简因其历史贡献而入选官修大型百科工具书《辞海》，是与潘一志誓为民族英烈立传的努力分不开的。民族史学界的许多专家曾说，不肯定潘新简，就意味着不承认水族的革命斗争史，水族学者石国义多次在相关的学术会上感言：“可以说，没有潘一志，就没有潘新简。”

4. 潘一志一生共创作诗词 500 余首，他自己曾将其 300 余首编为“浪游集”、“归农集”和“新生集”三集，总冠名《新旧人生观》。这些诗词，大多成稿于作者磨难多多、行路艰危的人生旅途之中。潘一志先生的人生经历特别复杂。他先在父亲执教的学馆接受了 15 年的儒学训练，后又到都匀十县合立中学学了四年新学。走入社会后，他当过兵，做过小学教师、校长、中学教导主任，后又进入政界，试图通过政治道路来实践自己报效国家的种种方略，他曾任民国县府的职员、科长、专署的秘书、科长等职，足迹遍及贵州的南北西东。在官运最顺而理想一次次被粉碎之后，潘一志毅然辞职，归隐深山，决心与政治决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经人民政府多次邀请，他才出山参加工作。土改时期，因为是荔波县土改工作队的领导成员，为了打开水族同胞聚居地区的工作局面，潘一志主动要了一个地主成分，将他早在 1929 年就给了无田少地农户的 20 亩祖田再一次分配；在粮食统购统销时期，他为农民说话，质疑省政府人均留粮 360 斤的规定；在北京参加中央民委的座谈会，他大胆陈述水族地区经济、文化和法制的落后，请求中央给予大力扶持；在“大跃进”初期，他“不识时务”地建议推迟少数民族地区的公社化进程等等；因此，“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潘一志就成了黔

南被揪斗的第一个州级干部。自选集《潘一志诗词》，收录了作者 20 世纪 20 年代至 60 年代各个历史阶段的作品，这些诗词在抒发个人情怀的同时，也记录了贵州半个多世纪的政治风云和人间情态，如《过花江河》、《上关索岭》就描写了贵州军阀混战的血腥及其所造成的灾难；《荔波浩劫纪实并序》全景式地记录了“黔南事变”时日本侵略军对贵州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毕节杂感》则真实地记叙了民国末期黔西北人民在贫困中挣扎的悲苦与无助；《农场苦乐歌》抒写了作者弃职隐居后远离政治、亲近山水的生活情趣；《出山行》将他在新中国之初重入社会的情态表达得栩栩如生；组诗《反“黄昏思想”》则表现了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天真可爱的另一面。诗如其人，潘一志的诗作就像一篇篇记事、写景、抒情的日记，记下了他坎坷的步履，也记下了他耳闻目睹的社会万象，其中许多作品的艺术愉悦功能已被社会历史的纪实功能所取代。这些诗作，在表述作者孤独的精神世界和渴望国家和平安宁的迫切心情时，也写意似地为我们描绘了一段变化多端的贵州历史和作者痛苦跋涉的一生：兴仁夜暗，花江血雨，正安恶梦，台拱迷雾，归隐洗心，出山欣喜，晋京诤谏等等，笔墨或浓或淡，都十分生动而真实。《潘一志诗词稿》的“浪游集”，记写的主要内容是民国时期贵州动荡不安的社会景象及民众的困苦生存状态；“归农集”，是一个正直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逃离官场后精神和思想的轻松释放，作者“平生不与人争利，偏向荒山刮地皮”，“人能节用家常足，士不争名品自高”这些写于避世茅寮中的诗、联，已在民间广为流传；“新生集”则记叙了作者解放后紧跟革命形势的各种际遇，这部分诗词更为率真地反映了建国之初至“文化大革命”之间国家建设的巨变与时代变革的剧痛。这次